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库

珞珈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

# 单向度 超真实 内爆

——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

石义彬 ▶ 著



全国优秀出版社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获 武汉海德广告公司研究资助

珞珈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  
丛书主编 罗以澄 张金海 单波



全国优秀出版社  
武汉大学出版社

**单向度、超真实、内爆**

——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

石义彬▼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石义彬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2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

珞珈新闻学与传播学丛书/罗以澄 张金海 单波主编

获武汉海德广告公司研究资助

ISBN 7-307-03762-9

I. 单… II. 石… III. 传播学 IV. 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6089 号

责任编辑：宋玲玲 高 璐 责任校对：张 昕 版式设计：支 笛

---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whu.edu.cn)

印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960 1/16 印张：23 字数：306千字

版次：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307-03762-9/G·607 定价：30.00元

---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者，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 目 录

---

绪论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中审视西方传播理论 .....	1
<b>第一章 单向度的传播</b>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 .....	4
第一节 绝望中寻找“希望”的边缘人 .....	4
第二节 那个时代的“理性”和失去理性的传媒 .....	8
一、人的异化和那个时代的理性 .....	8
二、失去理性的媒介 .....	10
第三节 “多元决定论”与媒介意识形态 .....	15
第四节 文化工业 .....	25
一、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观” .....	26
二、“文化工业”的特征 .....	30
三、媒介与“文化工业” .....	35
第五节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理论的现实意义 .....	39
<b>第二章 从社会批判到理想主义</b>	
——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研究 .....	44
第一节 哈贝马斯的传播思想概述 .....	46
一、哈贝马斯的学术简历 .....	46
二、哈贝马斯与传播学 .....	47

第二节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	53
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写作背景 .....	53
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渊源 .....	55
三、公共领域理论的发生史、内在矛盾 .....	57
四、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 .....	66
五、公共领域的重建 .....	69
第三节 交往行动理论 .....	70
一、公共领域的困境及其解脱 .....	71
二、普通语用学 .....	74
三、交往合理性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	77
第四节 哈贝马斯的传播学思想与当代中国 .....	82
一、关于公共领域理论的评价 .....	82
二、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公共领域理论的实践考察 .....	88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依法治国 .....	92
四、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历史考察：传媒领域阶段 .....	97
五、中国传媒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发展 .....	102
六、媒体公共领域与人大监督 .....	108
七、对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的简单评价 .....	112
第三章 “编码/解码” 开启传播学研究另一扇门	
——斯图亚特·霍尔的传播思想研究 .....	116
第一节 霍尔的生平 .....	116
第二节 英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	120
第三节 斯图亚特·霍尔的传播思想 .....	139
第四节 斯图亚特·霍尔传播思想的理论来源 .....	151
第五节 对霍尔文化研究及其传播思想的一点思考 .....	165
第四章 内爆的“地球村”	
——麦克卢汉的技术乌托邦主义传播思想 .....	177

第一节 奇才或是怪物? .....	177
第二节 麦克卢汉的标志: 独特的麦克卢汉式表述 方式 .....	181
一、“像泡澡”一样进入我的作品 .....	181
二、艺术家的眼睛——格言警句加暗喻堆砌 .....	183
第三节 媒介即讯息 .....	185
一、媒介就是人的延伸 .....	185
二、讯息就是新的尺度 .....	187
三、媒介是什么讯息 .....	189
第四节 地球村与内爆 .....	198
一、地球村——时空消失的人类新部落 .....	199
二、重新部落化——麦克卢汉的乌托邦世界 .....	203
三、卡德穆斯降龙的牙齿——媒介技术的力量 .....	206
四、电子媒介时代的警铃——内爆 .....	210
第五节 弃儿重回批判理论阵营 .....	212
一、麦克卢汉的学术认同 .....	212
二、方法论上对批判阵营的回归 .....	215
三、麦克卢汉的理论贡献 .....	216
<b>第五章 仿真、超真实、内爆</b>	
——鲍德里亚的传播理论与思想 .....	219
第一节 鲍德里亚的传播思想概述 .....	221
一、鲍德里亚其人 .....	221
二、鲍德里亚的理论定位 .....	224
第二节 鲍德里亚理论的历史系谱 .....	228
一、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 .....	229
二、罗兰·巴特: 物的符号学 .....	231
三、符号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源流 .....	236
第三节 鲍德里亚的符号批判理论 .....	246

一、消费社会与物/符号体系 .....	246
二、符号消费中构建的消费文化 .....	249
三、符号价值与广告图腾 .....	252
第四节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性媒介分析 .....	258
一、法国的麦克卢汉 .....	258
二、仿真、超真实、内爆 .....	261
三、视觉媒体与电视 .....	266
第五节 鲍德里亚媒介观的现实意义 .....	271
<b>第六章 女权主义的受众观 .....</b>	<b>277</b>
第一节 女权主义的兴起 .....	278
一、什么是女权主义 .....	278
二、女权主义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	283
第二节 女权主义流派及其受众观 .....	290
一、女权主义流派 .....	290
二、女权主义的受众理论 .....	294
三、心理分析/女权立场——后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受众观 .....	302
第三节 受众的乐趣/积极的反抗	
——后现代女权主义的受众观 .....	314
一、受众的乐趣/积极的反抗——英·昂的受众观 .....	315
二、“密室”读者与妇女杂志——珍妮斯·温史普的受众观 .....	326
第四节 女权主义受众理论的特征 .....	333
一、强烈的批判色彩 .....	334
二、立体化的研究方式 .....	337
结语：中国的女性受众 .....	343
<b>主要参考文献 .....</b>	<b>348</b>
<b>后 记 .....</b>	<b>360</b>

## 绪 论

# 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中审视西方传播理论

---

在西方，传播理论是一个多样化的、处于多学科以及多种思想方法相交叉的“十字路口”式的公共领域，诚如美国学者迪莉娅（J. Delia）所言，西方传播学从未依赖单一的知识来源，也从未统一过。<sup>①</sup>因此，它是一个难于把握的学术领域。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此领域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清理，但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他们大多偏重于用抽象的、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来涵盖具体的、历史的、呈现文化多样性的传播理论表述，这就难免产生各种各样“以偏概全”的研究模式，而在科学主义的视野下，这些被总结出来的研究模式又不断遭受广泛的质疑，以至于得出“传播科学尚处于‘前范式阶段’”<sup>②</sup>的判断。其实，问题并不在于传播理论有没有范式或能否用单一的研究范式来界定，而在于传播研究的“场域性”（contextuality）和人类传播活动的“不确定

---

① J. Del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 History”. In C. R. Berger & S. H. Chaffee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Science.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7, pp. 20-99.

② R. Craig: “Communication As a Practical Discipline”. In B. Dervin et al (eds.): Paradigm Dialogues in Communication: Vol 1: Iss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9, pp.97-122.



性” (indeterminancies) 摧毁了为建立抽象的研究范式而设立的权威性学术话语。

1981年,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和斯文·温德尔(Sven Windahl)的《大众传播模式论》(Communication Models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一书出版时,西方学者构建传播研究模式的热情还没有减退,他们对模式的遵从依然建立在模式的构造功能、解释功能、启发功能和预测功能之上,但这两位学者当时还算比较清醒,认识到“模式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整、过分简单以及含有某些未被阐明的假设等缺陷,适用于一切目的和一切分析层次的模式无疑是不存在的”<sup>①</sup>。同时还看到,“因为大众传播研究的不同途径涉及到互不相容的不同侧重点,有时涉及到前后矛盾的理论,因此,任何一个全面性模式都可能混淆各种科学的探讨,不可能正确说明现实真实的思想状况”,另外,“一个单一的全面性模式可能会无形中肯定一种单一分立的传播过程的存在,即由作为信息来源的社会传向作为受众的社会”<sup>②</sup>。到1994年麦奎尔的《大众传播理论导论》第三版面世时,研究模式的思想已淡化,开始以人文主义研究方法和科学主义研究方法为横轴,以媒介和社会为纵轴,把传播研究切割成媒介—文化论、媒介—唯物论、社会—文化论以及社会—唯物论四个不同的面向。显然,这种分析把西方传播研究带到了由“媒介、文化和社会”构成的“场”,呈现出传播研究的“场域性”,放松了主流传播学那种以“传播者—讯息—通道—受众—效果”为模式的操纵力量。

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知识的一种后现代状况,甚至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物理学和数学方面),一些理论家倾向于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关于“无序”的微观模型上,而较少关心“有序”的精

① [英]丹尼斯·麦奎尔, [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4页。

② 同①,第13页。

致理论视野<sup>①</sup>。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说，“后现代知识不是权威的一种工具，它提炼我们对于差异性的敏感性，并且强化我们容忍那些无共同尺度标准而无法比较的事物的能力”，同时，人们也对先前曾给予科学的规则以合理性的“共识”产生了怀疑，“大理论”模式的权威开始消解，更关注场域和社会生活的意义等问题<sup>②</sup>。文化批判研究在西方传播学领域的兴起与扩散与其说是某种研究模式的扩散，不如说是在后现代知识潮流的推动下，西方传播研究向“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的转向。其实，任何传播研究模式都是在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产生的，只不过我们对这一事实不够重视，总是习惯于泛化传播研究模式或制造适应全球传播的大传播理论模式，以至于传播理论之争常常被简化为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之争，很少把目光投注到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去，从而在权威话语的操纵下描述传播现象。这可以说是现代传播理论表述的危机，它意味着传播理论转变过程的开始，即向“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的转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不应仅仅局限在理论模式和方法的层面，还应在“媒介、社会和文化”的场域、意义中去重新审视西方传播理论，或者说，我们要把西方传播理论的解释由以前的理论模式和方法之间的冲突和矛盾问题，转换成特定的“媒介、社会和文化”场域、意义中的表述问题，以真实地理解其发展的历史和逻辑。

<sup>①</sup> James Gleick: Solving the Mathematical Riddle of Chao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June 10, pp. 30-32.

<sup>②</sup> 转引自 [美] 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科学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7 页。

## 第一章

# 单向度的传播

——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思想

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而言，法兰克福学派无疑是其始作俑者。从早期的阿多诺、霍克海默、本雅明到第二代的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众多知名思想家都致力于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文本中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为出发点，整合弗洛伊德、阿图舍等人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等现代思想，对现代社会，尤其是处于后工业时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文化形态进行了跨学科考察，并提出尖锐的批评，从而为我们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对现有媒介传播活动及其文化进行批判提供了背景广阔的模式。

### 第一节 绝望中寻找“希望”的边缘人

法兰克福学派源起于1923年2月3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的“社会研究所”，它以哲学思辨见长。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是不可分的。该所由费里克斯·韦尔（Felix Weil）创建，当时研究所的成员们希望能在德国正规大学生活之外，从事被高等教育忽视的一些学术研究，如工人运动史、反犹太起源等。

研究所不与任何官方的党派建立联系，以较强的思想独立性闻名。不过，在以哲学流派丰富、哲学底蕴丰厚而闻名于世的德国，研究所成立之初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1923年至1929年间，当时著名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卡尔·格吕堡担任了研究所的所长。在他的带领下，马克思主义成了“社会研究所”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没有什么理论创新，而研究所成员又经常在咖啡店等公共场所争论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因此研究所被学生们笑称为“咖啡店马克思”。<sup>①</sup>

在研究所的历史上，霍克海默是历时最久的所长。阿多诺也曾在1955年协助过霍克海默管理研究所。他们都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

从30年代起，“社会研究所”的命运就变得漂泊多舛。1933年，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及其对德国思想界的禁锢，研究所迁往瑞士的日内瓦。到了1935年，随着欧洲战事的蔓延，“社会研究所”又不得不离开欧洲大陆，迁往美国的加州。面对新的受众和新的社会环境，研究所成员被迫改为用英文写作。自1939年出版《惩罚和社会结构》后，研究所的所有出版物都以英语的形式和读者见面。“社会研究所”的成员在美国感受到离开母语和熟悉的环境的重重困扰。因此，在1953年，“社会研究所”迁回法兰克福大学，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成员也追随研究所回到了重拾和平的德国。

与“社会研究所”的命运一样，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在学术岁月中也经历了多次漂泊流离。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几乎都是犹太人，生于19世纪末期，在德国成长学习。他们和他们的民族一起在德国度过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初。在最富激情的青年时代，他们遭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多人在这次战争中成为激进的青年运动分

---

<sup>①</sup> [美] 马丁·伊杰著：《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子；中年进入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期时，他们又遭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受到纳粹的迫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对无产阶级革命失去了信心，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浓厚的反犹色彩又把他们作为德国社会“边缘人”的地位无情地凸现出来。为了躲避日益猖獗的纳粹反犹主义，他们迫于生存的压力不得不远离故土，流亡美国。马尔库塞在1934年流亡到美国，后转移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阿多诺则在1938年接受了拉扎斯菲尔德提供的主持音乐节目研究的工作，后又辗转到加州继续他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研究，直到1949年回到德国。战争结束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还加入了美国籍，研究所的德语刊物《社会研究杂志》也停刊了。

流亡的生活中，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在两个不同的大陆高举批判的大旗，播洒了批判的种子。他们还在两个大陆上不懈地寻找理想的“乌托邦”家园。但是，战火纷飞的欧洲大陆和歌舞升平的美洲大陆都没有给他们以“希望”。

到美国前，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对这个国家是很有好感的。阿多诺在1937年第一次踏上纽约的土地时就决定一旦有机会就到美国来。霍克海默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版的英文刊物写序言时，也憧憬满怀地写道：“哲学、艺术和科学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已失去了他们的家园，英格兰正在为反对集权国家的统治而战。美洲，尤其是美国是科学生活可能继续的惟一大陆，我们在这个国家民主机构的框架内，文化仍然享受着自由。我们坚信没有这种自由，文化就不能生存。”<sup>①</sup>

可是，随着对美国大众文化研究的日渐深入，研究所成员被另一种绝望所笼罩。他们发现欧洲法西斯的高压和恐怖统治，在美国是以一种和缓的强求一致的方式进行着。这种手段在文化领域表现

---

<sup>①</sup> [美] 马丁·伊杰著：《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得最有效也最明显。资本主义依然继续着它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榨，而这个事实似乎被8小时以外喧嚣热闹的大众文化掩盖了。因此，“社会研究所”30年代的工作主要是对法西斯主义的揭露、分析和反抗，而到了40年代，美国的大众文化就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研究对象。

在研究主题发生变化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发现，随着垄断资本主义越来越成熟，推翻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束缚，建立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之国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如果说过去的纳粹是用高压和强制来建立和维护极权的话，那么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不需要这种明显的恐怖主义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已经被纳入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之内，被大众文化所麻醉，根本就没有探求另一个幸福世界的斗志和欲望，“机会越来越少了”<sup>①</sup>。

其实，在没有流亡美国之前，研究所有的成员已经预感到了这样的状况。在著作中表现得最为乐观的法兰克福学派大将本雅明对美国的文化生活一直感到一种压迫，即使在纳粹最猖獗之时，他也一直拒绝研究所要他加入纽约办事处的要求。1940年，本雅明的寓所被盖世太保侵占，他不得不翻越比利牛斯山到西班牙再转道美国。带着旅途的疲惫、对盖世太保的精神恐惧和对美国前景的毫无信心，本雅明吞服吗啡复合物自杀，研究所就此痛失一员主将。

今天，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研究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尤其是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第二代成员已经成为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在对现代性的批判层面继续着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精神。哈贝马斯的传播理论将在其后章节中具体论述，本章将致力于对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思想的梳理和总结。

---

<sup>①</sup> Adorno and Horkheimer: *The Enlightenment of Dialectic*. <http://www.uta.edu/huma/illuminations>, 2000年2月22日浏览。

## 第二节 那个时代的“理性”和失去理性的传媒

### 一、人的异化和那个时代的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来自对马克思的早期文本的理解，其理论渊源继承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青年时代的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人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方式进行正面和负面的分析，弘扬了人类理性的自我批判精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法兰克福学派在道德伦理意义上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们面对着西方人所面临的普遍的文化—历史困境，冷眼观察着纳粹铁骑控制下的德国和看似民主自由的美国。带有深刻的欧洲大陆人文主义传统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一直热切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并目睹到人的理性向“工具性理性”转变的过程。

对“理性”的讨论本来就是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人类漫长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个理性逐渐战胜感性、突破感性的过程。按照阿伦·布洛克的观点，用人类历史上几个思想极度繁荣解放的时期作为分界点，我们可以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和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以及新世纪等。文艺复兴前的第一代思想家们用他们骄人的工作唤醒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人是可以思考和总结的。人具有理性，人可以用理性来关注自己，而不仅仅是由上帝或神灵主宰。经过了长期而艰苦的酝酿后，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带着人间悲苦色的基督和圣母画像，有了将人类自身作为分析对象的莎士比亚戏剧。进入启蒙时期后，人们对理性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人类不仅相信自己可以拥有理性，而且用理性演绎方法，得出了叫做“科学”的答案，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我们有了褒扬和预言“科学”的培根，还有一生为科学做注释的天才——牛顿。“大自然和大自然的法则躲在黑夜里，上帝说：‘让牛顿干去！’”

一切就大放光明了。”<sup>①</sup>

理性向一切过去由感性占领的领地发出挑战，不断地解除神秘，不断地构建一个由理性定义的社会。在工业革命时期以及以后的岁月中，人们不再信仰任何神灵而是有了新的膜拜对象，那就是“理性”自身。一个“理性”不断膨胀的时期从此展开。在这样的时期，人们的真实需求被压缩成条例与法规，冰冷的机器压迫在每个人身上。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技术理性将人改造成越来越畸形的生物。机器成为政治工具，工业产品灌输、控制并促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并由此加强劳动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整合。结果，劳动阶级不再为物质的匮乏而发愁，不再知觉到自己的被奴役性，反而相信自己很幸福，过着富裕的生活。但这所谓幸福却是虚假的，是机械化掩盖了人被物化的本质。劳动阶级仍然是受剥削、受奴役的阶级，仍然是作为工具和“物”存在，工业社会虽给劳动阶级带来了生活的富足，但本质上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命运。

受到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关注的尼采毕生着迷于非理性研究，醉心于对理性的攻击。他在其早期著作《悲剧的诞生》中让读者看到了希腊文化除了有极受重视的理性的太阳神面孔以外，还有人生中阴暗的、非理性的酒神。他以他派给自己的狂人角色对世界宣称：“上帝死了！上帝仍旧死了！是我们杀死他的！我们怎样才能安慰自己……我们，一切凶手中最大的凶手？”他要用异乎寻常的震撼力表达在19世纪末期许多知识分子和作家要与那个过分有组织和过分理性化的文明决裂的冲动，要让本能和感情超越理智的冲动。同样，让法兰克福学派冠以“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弗洛伊德认为理性是超自我，因为理性是自我的控制，是强加于自我的。现代文明中理性的进步是以对本能的隐抑为代价，是痛苦的。因此弗洛伊德认为在进步、文明与不幸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

---

<sup>①</sup> [英] 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5页。



法兰克福学派承认理性的多样性，但它强烈地反对被它称做是“工具性理性”的理性，因为这是一种用来创造和实现某种目的的方法的理性，同时它还把其他东西变成方法，变成工具。所以，这种理性给人带来的结果是坏的而不是好的。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的意识被不断启蒙。人从崇拜神到自认为神，经历的过程是人类获得“理性”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获得的只是“技术理性”，一种“工具理性”，而不是真正值得骄傲的理性。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撰写《启蒙时期的辩证法》意在提醒大家对这种理性进行反省，对曾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提出后现代学者的质疑。马尔库塞对人的“异化”的反复论述也是对在充满“技术理性”的世界里，人越来越脱离人的自然本质状态的不满与抗争。

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对“异化”、“理性”等概念的论述与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背景也不无关系。因为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上个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理性和科学都已经发展为“荒谬”的阶段。纳粹的统治是理性被极权利用的一个极端的典型，其象征之一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杀人场。纳粹的谬论是鼓吹“理性”的，他们极其“理性”地规划人类的未来，甚至连人种都要“理性”地安排。纳粹在德国的猖獗就是理性屈服于强权的象征。如果说理性使人们获得科学，发展科学，使人们享受便利与舒适的生活，那么它同时又像一项技术一样不分选择地被不同的观念利用，诱使人们沉迷于科学的进步而忘却了科学进步背后人类生活的本质和人之为人的真实需求。

## 二、失去理性的媒介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成了被工具的、主观的理性纳入技术统治下而被操纵的典范。纳粹德国时期是个收音机的时代，无线电广播是最具技术含量和宣传效果的媒介机器，也是希特勒控制和操纵媒介文化的主战场，所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